

经济虽然新常态 投资仍然很重要

李宇嘉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告别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制度改革红利和投资这三大增长要素从2008年起开始出明显减弱的趋势:劳动人口(15-59岁)绝对数量从2013年开始减少、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人口红利这一动力开始减弱;国民储蓄率在2008年达到53%后,开始见顶回落;人口红利衰退和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投资速度也会回落。传统增长动力的边际效率开始出现加速下滑的趋势,必须通过改革向新的增长模式迈进,形势非常紧迫。

新常态的另外两个特征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很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失衡(第二产业比重高、第三产业比重低)、分配结构失衡(积累比重高、消费比重低)和企业结构失衡(国有企业强大、民营中小企业弱小)都与投资倾向

过重、投资占比过高有关。因此,要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顺利转换,必须要降低投资的比例。

但是,目前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将投资占比与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占比不下降,依赖要素和投资驱动的模式就无法退出,经济结构优化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事实上,这是对投资的误解,投资短期内看是需求,但长期看是供给(未来生产能力的供给和消费的供给)。将一定时期的劳动剩余储蓄起来(而不是完全消费掉)并用于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增加未来的消费,而且为未来扩大消费和消费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如加大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为未来消费增长和升级奠定物质基础。

即便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也大多要依附于物化的资本上,并通过投资来检验技术的可应用性和未来改进的方向。例如,我国的高铁技

术之所以在国际上称得上领先,主要基于国内各大城市大规模投资建设,并将在长期运营过程中暴露和发现的问题解决掉,让高铁这项技术变得稳定成熟和可以立即推广。从这个角度看,物质资本的投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同时要看到,投资是要讲究效率的,即当前投资能否转化为未来的消费、能否为未来消费扩大和升级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从而在“投资-消费”的循环中实现技术进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目前,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只有15%左右,如此低的投资率之所以能够满足消费需求 and 实现技术进步,一方面在于过去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已经通过大规模投资(投资率在80%左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就在于其较高的投资效率,这主要源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让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被充分润滑,而发挥市场和民间投资主力军的作用,又有利于充分激励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投资增长一直在25%左右,投资占比在50%以上,但我国经济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依旧很严重。据估计,2010年底我国的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30%,人均资本存量不足美国的8%、仅为韩国的17%。目前,我国人均铁路拥有量为5.7厘米,在世界100名开外;人均水电装机容量不到1千瓦,仅为发达国家的1/3,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医疗卫生投资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投资过剩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重复投资,而非是全社会投资过剩,而且过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投资效率低下,突出表现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5。我国未来在教育、医疗健康、环保、地下管网、美丽乡村、城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缺口还很大。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仅存在“欠账”,而且在未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其增量需求潜力还很大。而且,我国以高铁为核心的基建技术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立足,就在于大规模的研发并用在投资实践的检验上。未来,基于国内广阔的投资空间,随着上述领域投资的增长,我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上的技术实力将会进一步显现。

而且,上述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有完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的性质,能够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及降低消费成本,而城镇化和消费增长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促进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外来农民工从产业工人变成技术工人,这是我国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当前,尽管我国原有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和储蓄红利正在减退,但三中全会以来“五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已经破冰,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全覆盖为标志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将释放。在制度和人口红利潜力仍旧可观的情况下,再考虑到我国储蓄率仍高于发达国家,若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激活市场投资效率,再辅之以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我国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 鹏眼 | Huang Xiaopeng's Column |

“安倍经济学”一地鸡毛 三大问题铸成败局



黄小鹏

上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推迟原定的第二阶段消费税上调计划,并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在吸引了全球市场注意力的“安倍经济学”推行即将满两年之际,此举既是安倍为其经济政策作最后一搏,也基本上宣布了安倍经济学的破产。安倍上台以来,其经济政策被寄予厚望,金融市场也以上涨表欢迎,但笔者从日本经济困境根源,结合安倍政策的逻辑,一开始就相信它最终会是一地鸡毛。

安倍经济学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激进的货币刺激、财政刺激和全面结构性改革三位一体推进,以前两者打破通缩循环这个命门激活经济,再在此基础上推进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并通过增长解决债务问题。这样的全盘经济振兴计划,看上去十分完美,无懈可击,但为什么说它必然会失败呢?

首先,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历史经验,预示失败成为必然。

日本是最早实施零利率和QE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零利率,2001年开始实施QE。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从表征到根源都没有变,实施了20年的极宽松货币政策都没有解决问题,安倍有什么法术让它在自己手上见到奇效呢?

量化宽松对日本经济拉动只能靠汇率,由于日本出口依存度高,且在某些行业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人们对货币宽松带动外需、进而把经济拖出通缩寄予很大的希望。从实际情况看,从2011年底到现在,日元最大贬值幅度接近50%,企业利润上升,推动日股上涨,物价也开始显露出上升的苗头,似乎经济正在按预期那样出现良性变化。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变化大部分由于日元贬值引起的数字账面变化。据统计,去年日本制造业八成新增利润来自贬值产生的会计效果,而出口并不乐观,2013年出口名义值比上年增长9.5%,但表明出口数量的指标却减少了1.5%,贬值等因素还导致出现连续三年的贸易逆差。

上述因素,加上消费税上调预期推动下的一次性消费上升,使得刺激的成本立即可见,刺激一推出负债比率就上升。在经典凯恩斯理论中,财政刺激政策只适用于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当经济调头向上时,税收增长支出减少,债务因之下降,此时作为分母的GDP还会增大,这样债务率随经济回升而下降。但日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每一次刺激都只有短期且微弱的作用,负债率随着经济上升而回落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它的负债率持续爬升了20多年。1991年日本债务/GDP为67%,现在升到令人咋舌的230%,远高于美国、欧洲,甚至比意大利、希腊还要高出很大一截。

严峻财政形势下,政府和民间心理压力都很大,往往是刺激一段时间,经济刚露出一点好转的迹象就赶紧“撤火”,但过一段时间看经济太差难以忍受,又重新祭出财政刺激。如此三番,有的人就会觉得经济之所以不能持续向好,是因为前一轮财政刺激“撤火”过早。所以这

打开巨额停车费信息黑箱

张枫逸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个城市汽车总量已超1200万辆。汽车停靠在路边政府划定的车位上,车主每次动辄要付出十几元甚至数十元的停车费。但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车主缴纳的停车费与政府财政所得之间存在巨大差额,至少有一半收上来的钱最终没有进入政府的口袋,一些地方财政的相关收入甚至是零。

按照停车管理的制度设计,车主向停车管理者支付停车费,停车管理者则要向政府缴纳占道费和经营权使用费。然而,现实情形是停车管理者日进斗金,政府财政却并未从中收益多少。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质疑,北京市每年停车收费保守估计大约百亿,但进入国库的仅有区区几千万。如今,这一现象不再仅限于北京。

通过停车费这一“经济杠杆”限制车辆使用,减轻交通压力,同时将停车费用于道路设施建设和公共交通发展,从而扩大城市交通的容量,改善出行秩序,是一举两得的好事。然而,巨额停车费进入黑洞,阻断了城市治堵的良性循环。停车费取之于民却未能用于之民,让渡了停车自由却未能获得应有回报,形同被打劫。

2011年4月1日起,北京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这本是继实施车辆限行、摇号限购政策后又一项旨在“缓解拥堵”的政策,但媒体和公众却并不买账,纷纷诘问:“动辄400%、500%的惊人涨幅,是否包

含了个别部门与停车企业的私心?”因为这里严重的信息不透明,必然导致民众的怀疑和不满。一些城市停车管理中的一连串怪事,让人大呼“看不懂”。一些城市声称对车位经营资格进行招投标或特许经营,但结果要么是一些办公简陋、人员极少的“皮包公司”,“特许经营”管理着黄金地段的大规模停车位;要么是招标方特意修改投标人资质门槛,使得一些不具备资格的公司顺利中标。有的停车企业长期不按时按标准缴纳占道费,甚至从来没有给政府缴纳一分钱,其收费经营权依然稳如泰山。这停车费收得稀里糊涂,去得不明不白,民众自然有理由怀疑里面存在严重的腐败。

目前,由于预算管理的不严肃,各地大多以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停车费收入列入政府非税财政收入,这为管理和监督留下漏洞。一方面,经营权出让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存在极大的随意性,甚至和街道办领导打个招呼就能开个停车场;另一方面,政府向停车管理企业收取的经营权费用、占道费很少被单独公示,缺乏人大审查和公众监督,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

巨额停车费绝不能成为“糊涂账”。有关方面必须对现存的停车费中可能存在的腐败进行调查,把这里面的信息黑箱揭开。同时,必须完善管理,严格招投标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定期向社会公布收支情况,列出详细清单,杜绝“跑冒滴漏”,切实去除其中的腐败。

少林寺招媒体总监300人应聘,多有海归背景



少林寺玩新媒体,招聘总监来管理。利弊几何当别论,追赶时尚很积极。待遇不错平台高,海归争相投简历。舆论风议释永信,佛门经商是难题。

郭喜忠/漫画
孙勇/诗

寿光火灾事故折射中小微企业监管漏洞

周俊生

山东寿光龙源食品有限公司胡萝卜加工车间近日发生一场大火,导致18人死亡。随着舆论热点的转换,在这场大火中逝去的18条鲜活的生命,很快就被我们遗忘了。

可以预期的是,最终的调查结论无非是安全生产设施不到位,有关人员严重失职。但是,媒体的及时报道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发生于基层中小微企业中的一个共性问题,企业为了将经营成本降到最低,厂房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简陋,生产工艺原始、落后,工人劳动环境十分恶劣,以龙源公司为例,它的主要建材都是易燃品,而之所以会如此,唯一原因就是降低经营成本。今年8月发生的昆山由粉尘爆炸引起的重大燃爆事故,究其原因同样是因为企业老板不愿意花钱建立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基本设备。

随着经济转型,政府开始把企业安全生产作为重要事项来常抓不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企可以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安全生产要求,甚至只是国企高管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加大对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

但是,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中小微企业却不是这样,从目前暴露的一些安全生产事故来看,一方面是中小微企业自身缺少这方面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它们在这方面的监管存在很大漏洞。

任何资本都有逐利本能,而民营资本的逐利天性通常会远高于国有资本。这本是好事,它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对这种逐利天性如果不加以引导和规范,就会产生损害市场,或者损害社会的行为。市场上不时出现的有毒食品等,很多生产厂家来自民营企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便是不断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民营企业已经成为高发区。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的这种逐利天性却缺乏足够的认识,要么将其视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罪魁祸首”加以排斥,要么又将在逐利天性驱使之下出现的损害职工基本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也当作能够推进经济增长的正常量来看待。而这两个方面反映的都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和失职。

目前,中小微企业普遍出现了持续经营困难的问题,企业融资困难导致资金链紧绷。因此,政府正在陆续出台各种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

关,全社会都已形成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在这种背景之下,地方政府很容易产生对中小微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是不是会加剧其困难的担心,比如,寿光的政府部门即使看到了龙源公司的厂房建筑材料都是易燃品,昆山的政府部门即使看到了中荣公司的生产车间过于密集有严重的安全隐患,在这种心理驱使之下很难要求它们改建或者增加防火灭火设备,因为这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事实上,这两家企业只是因为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才使问题得到了暴露,而更多的同类企业则因为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故而被掩盖,而众多的地方政府部门也对此视而不见,这种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中小微企业在中国基层星罗棋布,它们就像火药桶,随时都会吞噬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打工者的生命。作为政府来说,既要做到保护民营资本政治的对利益追逐的权利,又要对其行使严格的监管,不让这种逐利天性变成出笼的老虎来危害社会。

帮助中小微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政府不断地简政放权来释放其原来受到行政审批束缚的市场活力,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必须放弃对企业的监管。事实上,政府必须更严格地履行起对

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职责,要求其建立起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厂房、生产设备和生产流程,是这种事中事后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因为这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而放任企业降低安全生产标准,以将职工置于危险环境来换取企业的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的失职,也是对企业家逐利利益的纵容,像龙源和中荣这两家公司,由于在安全生产投入上的缺失,事故发生后,它们事实上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事故负面影响也不仅局限于这两家企业,政府因为后续事件的处理也不得不支出大笔财政经费。

当然,提高中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从源头上堵住事故频发的出口,确实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在资金链已经紧绷的情况下,难免出现“无米下炊”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比如,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减负工作,政府可以考虑利用前期已经从中小微企业中收取的税费建立专项基金,强制要求中小微企业改造厂房,更换生产设备,使其符合安全生产标准。而对一些存有安全生产严重隐患的企业,则应坚决要求其停产治理,不能因为需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而偏废了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管。